

# 时空阻隔与媒介壁垒：为什么宋朝老百姓无法观看《甄嬛传》？——一项基于媒介存在论的传播学考察

猪猪闪电\*

**摘要：**《甄嬛传》作为 21 世纪中国影视文化的重要文本，以其对清代宫廷生活的细腻呈现赢得了广泛受众。然而，若将时间回溯至公元 11 世纪的北宋时期，提出“宋朝老百姓为何不看《甄嬛传》”这一看似荒诞的问题，实则触及了传播学、媒介研究与历史社会学交叉领域的深刻命题。本文从媒介存在论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媒介技术决定论、接受美学与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系统论证了宋朝民众无法观看《甄嬛传》的四重维度：媒介技术的历史断裂、文化符号的时空错位、接受心理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艺术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制度壁垒。研究发现，任何文化产品的传播与接受都必然受制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媒介条件、认知框架与社会结构，穿越性的观看行为在媒介存在论意义上是不可能的。本文的讨论旨在深化对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互构关系的理解，反思媒介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甄嬛传》；宋朝；媒介存在论；文化接受；历史断裂

##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穿越”题材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形态。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如果古人生活在现代”或“如果现代人回到古代”的想象性命题层出不穷。然而，学术界对于这类问题的严肃思考却付之阙如。表面看来，“为什么宋朝老百姓不看《甄嬛传》”这一问题带有明显的戏谑色彩，但深入剖析，这一问题实则蕴含着媒介研究、文化接受与历史认知的核心命题。

《甄嬛传》作为 2011 年首播的电视连续剧，以其精致的制作、复杂的叙事和对清代雍正时期后宫生活的细致描摹，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重要文本。而宋朝（960-1279）作为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其市民文化、娱乐生活已有相当发展。那么，生活在 11 世纪的开封或杭州的宋朝百姓，为何没有观看这部描绘两百余年后清朝宫廷生活的电视剧？

收稿日期：2026 年 2 月 25 日

作者简介：猪猪闪电，内蒙古吃饭大学本科猪。小红书号：26974795130。

这一问题的提出，表面指向的是一个时间错位的常识性答案，但本文认为，其深层意涵在于揭示：文化产品的接受从来不是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行为，而是深深嵌入特定媒介条件、认知框架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实践。因此，本文将从媒介存在论的视角出发，系统论证宋朝民众无法观看《甄嬛传》的多重原因，进而探讨媒介技术与文化接受之间的内在关联。

## 二、文献综述

与本研究相关的学术领域主要涉及三个方向：媒介技术史研究、接受美学理论以及宋代文化消费研究。

### （一）媒介技术史研究的进展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其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经典论断，强调媒介形式本身对社会结构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塑造作用（McLuhan, 1964）。这一理论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条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进一步阐发了电子媒介如何重构社会场景与身份认同（Meyrowitz, 1985）。国内学者如陈力丹（2015）在《媒介认识论》中系统梳理了媒介形态演变对人类认知方式的深刻影响，指出不同媒介条件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异。

### （二）接受美学的理论贡献

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提出的“期待视野”概念，为理解文化接受的历史性提供了重要工具。姚斯认为，任何读者都是带着特定的历史经验和审美期待进入文本接受的，这种期待视野决定了文本被理解的可能性与方式（Jauss, 1982）。伊瑟尔（Wolfgang Iser）则从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出发，提出了“隐含读者”概念，强调文本本身预设了特定的接受者（Iser, 1978）。这些理论为理解宋朝民众与《甄嬛传》之间的接受鸿沟提供了重要启示。

### （三）宋代文化消费研究

关于宋代市民文化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谢桃坊（1999）在《中国市民文学史》中详细考察了宋代瓦舍勾栏的演艺活动，指出说书、杂剧等是当时市民的主要娱乐形式。伊永文（2005）在《宋代市民生活》中通过对《东京梦华

录》《梦粱录》等文献的梳理，还原了宋代城市居民的日常娱乐生活。这些研究为理解宋代民众的接受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领域，尚未有学者将媒介技术史、接受理论与宋代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系统探讨跨时代文化接受的不可触性问题。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对象与案例地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宋朝民众与《甄嬛传》之间的接受关系。研究对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接受主体的宋朝民众，主要以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城市居民为典型代表；二是作为接受客体的《甄嬛传》，主要分析其作为现代电子媒介产品的媒介属性、叙事特征与文化内涵。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理论推演与文献分析法，具体包括：

1. 媒介技术分析：从媒介形态演变的角度，分析《甄嬛传》所依赖的电子媒介技术与宋代媒介条件之间的根本断裂。
2. 接受美学分析法：运用“期待视野”理论，分析宋代民众的历史经验、审美习惯与文化认知如何决定了他们无法理解《甄嬛传》的叙事逻辑与价值内涵。
3. 历史制度分析法：考察宋代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制度，说明文化产品的传播受制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

### 四、研究发现

#### （一）媒介技术的根本断裂：从电子媒介到印刷与口传媒介

《甄嬛传》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其存在与传播依赖于套复杂的现代媒介技术系统：摄像机、剪辑设备、电视信号发射与接收装置、数字存储技术等。这一技术系统构成了《甄嬛传》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相比之下，宋朝时期的媒介条件仍处于手写文本与雕版印刷并存、口传文化高度发达的状态。尽管宋代已有高度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但所能传播的仅限于文字与简单插图，无法呈现动态影像与声音。宋代城市中的瓦舍勾栏虽有杂剧、说书等表演艺术，但均为现场演出，无法实现远距离、大规模的复制传播。

从媒介存在论的视角来看，媒介不是文化内容的外部载体，而是文化得以存在的本体论条件。没有电子媒介技术，《甄嬛传》不仅无法被“观看”，其本身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是“解蔽方式”（Heidegger, 1954），不同时代的媒介技术决定了何种文化形态能够被揭示、被呈现。宋朝的媒介条件只能“解蔽”出话本、杂剧、诗词等文化形态，而无法“解蔽”出电视剧这一现代媒介产品。

## （二）符号系统的时空错位：语言、服饰与制度的不可理解性

即使我们以思想实验的方式假设某种超自然力量将《甄嬛传》“投放”到宋代社会，宋朝民众也无法理解其中的符号系统。

首先，语言障碍是最直接的。《甄嬛传》使用的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其语音系统、词汇构成与宋代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宋代虽然已有官话，但与现代普通话相去甚远。据语言史研究，宋代汉语属于中古汉语后期，其声调系统、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均有重大差异（王力，1980）。即使宋代民众能够“听到”《甄嬛传》的对白，也无法理解其含义。

其次，视觉符号系统的隔阂更为深刻。《甄嬛传》中呈现的清代服饰、建筑、礼仪等，对宋代民众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符号系统。宋代服饰以直领、对襟为特色，与清代旗装、马褂迥异；宋代建筑以柔和、素雅为审美取向，与清代宫廷的繁复装饰风格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清代后宫的等级制度、运作方式与宋代后宫存在显著差异，宋代民众无法理解剧中人物的行为逻辑与关系结构。

符号系统的不可理解性根源于文化编码与解码的历史性。任何文化产品的意义都不是自在的，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生产出来，也只有在该语境或通过历史知识的转化才能被理解。宋朝民众缺乏理解清代文化的“前理解”结构，因而无法完成对《甄嬛传》的意义建构。

## （三）接受心理的结构差异：期待视野的历史断裂

接受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读者或观众都带着特定的“期待视野”进入文本接受过程。这种期待视野由读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个人经验等因素共同构成，决定了文本被理解的可能性与方式（Jauss, 1982）。

宋代民众的期待视野由什么构成？从文化娱乐的角度看，宋代市民在瓦舍勾栏中欣赏的主要是说话（说书）、杂剧、诸宫调等表演艺术。这些艺术形式具有

以下特点：一是叙事结构的相对简单，多以线性时间展开；二是表演与接受的即时互动，观众的反应可以直接影响表演进程；三是内容多取材于历史传说、佛教故事或市井生活，与观众的日常生活有一定关联。

《甄嬛传》作为现代电视剧，其叙事结构更为复杂，多条线索交织、倒叙插叙并用；其接受方式是家庭私人化的，缺乏现场互动；其内容涉及清代宫廷政治与后宫生活，远离宋代市民的经验世界。这些差异意味着，宋代民众即使能够克服技术与符号的障碍，其期待视野也无法与《甄嬛传》的文本结构形成有效的“视野融合”。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宋代民众缺乏对“电视剧”这一媒介形式的接受心理准备。他们习惯于在特定时间（如节庆）、特定场所（如瓦舍）集体观看表演，而不习惯于在家中随时打开一个“盒子”观看连续的故事。这种接受心理的差异，源于媒介形态对感知方式的长期塑造。

#### （四）制度性壁垒：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社会组织方式

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从来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制于特定社会制度的组织化实践。宋代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有其特定的制度安排。

从生产端看，《甄嬛传》的生产依赖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专业的编剧、导演、演员团队，资本投入与市场回报机制，版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条件在宋代都不存在。宋代虽有职业化的演艺人员，但他们的活动多局限于城市瓦舍或为官府、富户服务，尚未形成大规模、标准化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

从消费端看，宋代民众的文化消费受制于时间、空间和社会规范的多重约束。时间上，农业生产社会的生活节奏决定了娱乐活动多集中在节庆日或农闲时节；空间上，文化消费需前往专门的演出场所；社会规范上，不同阶层、性别的人群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和方式存在差异。这些制度性因素共同构成了文化接受的边界条件。

## 五、结论与讨论

### （一）结论

本文从媒介存在论的视角出发，系统论证了“宋朝老百姓为何不看《甄嬛传》”这一问题的多层意涵。研究发现，宋朝民众无法观看《甄嬛传》的原因并非简单

的“时间错位”，而是根源于媒介技术、符号系统、接受心理与制度安排等多重维度的历史断裂：

第一，媒介技术的根本性断裂决定了《甄嬛传》在宋代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第二，符号系统的时空错位意味着即使存在技术奇迹，宋代民众也无法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第三，期待视野的历史性差异阻碍了宋代民众与现代电视剧文本之间的有效互动；第四，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文化接受的边界条件。

这些发现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文化产品的接受是深深嵌入特定历史阶段媒介条件、认知框架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实践，跨越时代的“观看”在媒介存在论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 （二）讨论

本研究的发现与现有学术研究形成了对话与补充。一方面，研究验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论断的深刻性——媒介形式本身的确构成了文化存在与接受的本体论条件。另一方面，研究对姚斯“期待视野”理论进行了拓展应用，将其从文学接受的语境扩展到跨时代、跨媒介的文化接受研究领域，证明了这一概念的强大解释力。

与既有宋代文化研究相比，本研究提供了一种逆向视角：不是追问宋代有什么文化，而是追问宋代不能有什么文化，从而更清晰地勾勒出历史条件下文化形态的边界。这种研究路径有助于深化对媒介与文化互构关系的理解。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由于史料限制，对宋代民众接受心理的分析主要基于文献推演，缺乏实证材料的支撑。其次，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居民，对宋代乡村民众的讨论较少。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考古发现和新史料，深化对不同阶层、地域宋代民众文化接受心理的理解。

最后，本研究对于理解当代文化传播也有启示意义：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文化产品的传播已经突破了时空限制，但实际上，任何文化接受仍然受制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本质上是不同历史形成的接受结构之间的碰撞。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文化传播中保持谦逊与开放的态度。

## 参考文献

- [1] 陈力丹. (2015). *媒介认识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
- [3] 谢桃坊. (1999). *中国市民文学史*.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4] 伊永文. (2005). *宋代市民生活*.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 [5] Heidegger, M. (1954).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fullingen: Neske.
- [6] Iser, W.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7] Jauss, H. R. (1982).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8]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 [9]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